

当代 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I

黄卫平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编

● 主编 / 黄卫平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I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I/黄卫平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

ISBN 7-80149-656-6

I. 当… II. 黄… III.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文集
IV. D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011 号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I



主 编: 黄卫平
责任编辑: 陈 燕 杨 群
责任校对: 张景秋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增富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9.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656-6/D·104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文库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 研究中心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曹龙骐

副主任： 苏东斌

编 委： 曹龙骐 苏东斌 黄卫平 董立坤
郁龙余 莫世祥 袁易明

作者简介

- 黄卫平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管理学院院长、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
- 王孝鸣 深圳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2000 级硕士研究生
- 萧俊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
- 汪永成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
- 郑维东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博士
- 李晓男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博士
- 唐元松 深圳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2000 级硕士研究生
- 朱国斌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留法博士
- 秦小鹏 深圳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2000 级硕士研究生
- 胡微微 深圳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2001 届本科毕业生
- 周永强 深圳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1999 级硕士研究生
- 吴章勇 深圳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2000 级硕士研究生
- 杨龙芳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
- 程浩 深圳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2000 级硕士研究生
- 谭功荣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 邹树彬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武汉大学硕士
- 张定淮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
- 刘建光 深圳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1999 级硕士研究生
- 吕元礼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前 言

黄卫平

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也给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课题。作为地处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感有必要将近年来的有关主要研究成果汇编成册，献给一切关心中国政治现实发展的人们。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是1998年起筹备，在1999年底由深大的管理学院正式设立的非法人研究机构，在2000年初深大组建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时，又成为特区研究中心的下属5个研究所之一。该所从成立起，就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路子，在既无专职研究编制，又无财政拨款的条件下，专以研究在中国政治发展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和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为己任，以研究人员的业余自愿组合为特点，并认为在政治学研究中，只有很好地坚持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特色，才有可能争取研究成果的“全球化”意义，积极、努力地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中，全方位地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

两年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率先发起了对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以“三轮两票”（又可称“两推一选”）为特点的镇长选举方式改革研究和对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的财政体制改革研究，先后

出版了《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最新突破——深圳市大鹏镇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政治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和《中国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沙井镇个案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两书；并先后完成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政府体制改革”研究项目的两个子课题：“我国政务类和业务类公务员分类制度的可行性研究”，“我国乡镇长选举创新研究”。目前正在承担的研究项目有：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中国乡镇长直接选举的渐进发展与选举制度改革研究”；教育部与广东省教育厅共建的省属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深圳市大鹏镇与中国其他地区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的跟踪与比较研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政府体制改革”研究项目的子课题“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问题研究”等。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在筹备和发展中，还积极致力于开展学术交流，曾于1998年5月与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党校、《深圳特区报》等合作，在深圳大学成功举办了我国较早的一次全球化问题的全国学术研讨会——“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学术研讨会，对推动我国的全球化问题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2000年4月底，在深圳市大鹏镇“三轮两票”选举镇长一周年之际，又与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理论处、中共大鹏镇委合作，在大鹏镇成功举办了“‘两票制’镇长选举方式改革”学术研讨会，对推动我国的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做出了努力，此次研讨会后来被评为深圳市社会科学理论界2000年的“十件大事”之一。

回顾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发展过程，深感这是社会各界和学术界同仁共同支持和帮助的结果。在研究所即将成立两周年之际，我们选编这本文集，在研究和探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也是对积极参与了研究所各种课题研究的同仁

们所做工作的阶段性总结，并借此机会向所有支持、资助、参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各项学术工作的有关部门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文集还收录了参与本所研究工作的部分学生的习作，其中不乏富有启发的见解，当然，也存在不足之处，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2001年8月18日
于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目 录

前 言	黄卫平 (1)
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王孝鸣 黄卫平 (1)
全球化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黄卫平 (21)
全球伦理与中国政治现代化	萧 俊 (31)
论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目标的次序和实现策略	汪永成 (40)
法治与德治关系简论	郑维东 李晓男 (49)
试论现行政治体制下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空间	唐元松 黄卫平 (60)
西部开发与对内开放及其法制环境建设	朱国斌 (73)
中国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秦小鹏 (87)
论现代人的政治冷漠	胡微微 (110)
两种理论特质	周永强 (123)
中国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的意义及困境辨析	黄卫平 (136)
中国电子政府的发展现状与滞后原因 及对策研究	吴章勇 (147)
邓小平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杨龙芳 (158)
论新时期执政党的利益集约和知识集约功能	程 浩 (173)

中国政务类与业务类公务员分类制度可行性分析	黄卫平 谭功荣 邹树彬 萧俊 (184)
选拔制度与选举制度辨析及启示	唐元松 (210)
关于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问题争论的综述	程浩 (223)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问题 学术研讨会综述	萧俊 (237)
“两票制”镇长选举方式改革学术研讨会综述	汪永成 张定淮 (242)
从经济市场化到全面现代化 ——邓小平、江泽民特区思想比较研究	刘建光 黄卫平 (251)
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理性精神 ——以邓小平、江泽民政治思想与实践为例	吕元礼 (264)
从《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 集团的斗争》所想到的	黄卫平 (282)

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王孝鸣 黄卫平

2000年春，江泽民同志先后到广东、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①，强调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并创造性地提出只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是执政党中央审时度势地为在新世纪加强和改善其政治领导，巩固和扩大其执政基础而发出的紧急政治动员令，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意识到必须不断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而奋斗的政治宣言，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学说，既是对党80年历史中成功与挫折的各种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新世纪党的执政地位政治合法性的时代诉求。

一 合法性和合法性的基础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legitimacy）观念，古已有之，

^① 参见新华社广州2000年2月25日电和新华社上海2000年5月15日电。

指的不是法学意义上的符合法律规范或法律原则 (Legality), 而是政治上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 是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一种公认的理念。实际上就是根据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判断, 由广大民众给以积极的社会支持与认可的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其内涵既包括政治统治能否以及怎样以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方式运行, 也包括政治统治有效性的范围、基础与来源。^①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政治合法性主要指公民对政治行为的自愿接受性^②。用通俗的语言表述, 政治合法性的程度如何与民众对执政者极其群体的信任程度和认同程度密切相关。早在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就对合法性有过初步论述, 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 “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必须使全邦各部分 (各阶级) 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 “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 一邦之内, 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③。孔子在《论语》中也有相关论述, “子贡问政。子曰: ‘足食, 足兵, 民信之矣。’ 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三者何先?’ 曰: ‘去兵。’ 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二者何先?’ 曰: ‘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公理”和孔子的“信”实质上已涉及政治合法性问题。因为政治合法性就是指政治统治获得了社会成员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和服从。

而在现代政治分析中重视合法性问题, 当属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 他认为, “一切经验表明, 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 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 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 任何统治都企图

① 参见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 第162~165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② 参见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 第126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③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第88、210页, 商务印书馆, 1996年中文版。

唤起并维护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①，对于任何既定的统治者来说，都必须为自己的统治寻求合法性基础。判定某一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并不在于统治者自己的宣称，也不在于统治者为自己的执政制定法律依据，而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是否真正认同。韦伯进一步指出：任何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类型不外以下三种：“1，合理的性质：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力的合法性之上”，即法理制度型；“2，传统的性质：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之上”，即神权传统型；“3，魅力的性质：（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即人格魅力型^②。且不论韦伯关于政治合法性三种来源的分类是否全面，以及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混合型，很显然，他认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是纯观念性的，特定时代的特定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是由民众的普遍信仰与信念决定的；但判断特定政权的统治是否与民众的普遍信仰与信念相契合，则又是经验实证性的。如果从合法性的精神特征来审视合法性的基础，凡是能够实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契合的传统习俗、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宗教文化等社会意识均构成合法性的基础。其中，意识形态在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统治者通过意识形态进行宣传教化，以获得信仰的权威，从而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为“合法性涉及该制度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社会需要的这种信念的能力”^③。

统治者靠什么获得被统治者的自愿服从呢？被统治者服从和信仰的心理动机是什么？这其实是要回答由什么构成合法性信念

①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239 页，商务印书馆，1998 年中文版。

②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241 页。

③ [美] 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 53 页，商务印书馆，1993 年中文版。

的现实基础。韦伯的答案是：“一个制度的合法性可通过下述情况得到保证：一、纯粹内在的……。二、也（或者仅仅）通过期望出现特别的外在的结果，即通过利害关系。”^① 韦伯在这里指出，在合法性诸多来源中有两种因素发挥重大作用，即精神性的“纯粹内在”和现实性的“利害关系”。显然，韦伯认为，民众对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认同，虽与内在的纯精神信仰、信念有关，但也不可回避地与该政权给他们带来的现实利益有关。

因此，作为精神存在的信仰、信念、意识形态并不是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根源，某种“利害关系”才是信仰和信念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②。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益关系，对各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满足是政治合法性的物质基础。治者对被治者利益的满足表现为政治统治的效果，政治统治的“有效性指实际的政绩，即该制度在大多数人民及势力集团如大商业和军队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也就是政治统治能否满足社会各阶级或阶层的功利性需求。一个政权“一再地或长期地缺乏有效性，也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延续几个世代，长期保持效率的政治制度可以得到合法性”，而“在现代世界，这种效率意味着不断的经济发展”。^③ 因此，只有占基础地位的执政的现实绩效和具有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有效保持一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

二 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在全国执政以来，其试图维护和巩固

①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72。

③ [美] 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53、56、57页。

自己政治领导地位的合法性诉求是有个变化过程的。

从1949年10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57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根源于其良好的执政绩效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其意识形态的认同，而前者占主导地位。就执政效果而言，党在建国初期的各项政策、主张满足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需求，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满足了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建国头三年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维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在长期战乱后逐步恢复了经济，符合人民的普遍愿望；而以后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尽管这一过程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对后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复杂影响，但在当时总体上还是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得到广泛肯定的，包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赎买政策，也基本维系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与联盟；国家的实质统一（除台湾省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都向中国人民证明了党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巨大能力。所有这些都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腐朽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又从反面更加确认了共产党是现代中国最有资格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就意识形态而言，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成功的毛泽东及其思想无疑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当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工业化方面表现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也成为中国人民敬仰的榜样，向人们展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能给落后国家带来现代化的前景，这使中国人民相信以苏联模式所诠释的“社会主义”不仅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能实现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强国之梦。因此，以苏联模式所诠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既通过在实践中获得成功，也由于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日益深入人心。可以说半个世纪前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生政权的巩固，是

党通过执政的有效性而奠定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同时由党所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也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

从1957年下半年到1978年底，执政党试图将合法性的诉求主要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仰之上，执政的经济效果退居次要地位。随着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党宣布在中国大陆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当时党对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再加上“长期任人欺凌、宰割，不甘落后的民族心态，苦战三年五载、奋发图强、赶超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使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在面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新课题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反而不谨慎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发展，集体领导制度受到破坏；照搬革命战争年代的旧方法和旧经验，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观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①，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很多具有猜测、想像和假说性质的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教条化，对毛泽东个人的政治威望和人格魅力偶像化。这时执政党的现实政治目标迅速指向一个被称为极左的意识形态所描绘的理想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情况下，党对合法性的诉求完全建立在充满极端激进、狂热和空想性质的极左意识形态之上，建立在期待民众相信党对未来“无限美好”社会的承诺之上，不仅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刮“共产风”，而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来清洗想像中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异己分子，忽视了执政的客观经济绩效和轻视了满足民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浪漫式经济发展的失败使整个国民经济遭受沉重的

① 石仲泉：《“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3期。

打击。虽然工业较快地摆脱了这次冒进的影响，但当时仍占国民经济很大比重的农业则多年未能恢复。这使整个政治体系的经济效果降到建国以来的最低点，从而使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更加依赖于民众对极左意识形态的迷信与狂热，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由于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完全依赖于民众对极左的意识形态的信仰与狂热，并越来越与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相联系，在“文革”后期，随着“文革”“副统帅”林彪的叛逃和葬身异域，以及在民众中自发反对“文革”的抗议活动 and 不满情绪逐渐蔓延，预示着以极左意识形态信仰为标志的合法性基础开始动摇。以至于1976年10月党内健康力量粉碎了极左的“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后两年内，当时主持执政党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人还想用“两个凡是”来延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维系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时，却恰恰违背了当时要求否定“文革”、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党心、民心，反而使他很快就失去了支持，不得不离开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岗位。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从1978年底到90年代末期，政治体系的经济效果重新取代意识形态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意识形态则起到第二道防线的作用。虽然“文革”打着实现“大民主”的旗号，但民众最终得到的却远非民主，而是一场内乱。正是极左意识形态的极端产物——“文革”所酿成的苦果，导致了以激进、空想、狂热为特征的极左意识形态的破产。这时党和人民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奉为教条的某些理论、观念的正确性，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对“两个凡是”的否定；从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到明确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旗帜鲜明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思想的步伐越迈越大，实事求是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但由于对过去极端迷信的某些理论教条的否定和对党所犯错误的反思，原来被视为政治合法性坚实基础的第